

1721/
9.9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
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

蒲鲁东言论录

列宁在十月武装起义的日子里

纪念威廉·李卜克内西逝世八十周年

《格拉纳特百科辞典》人物传记选译



9

马 列 著 作 编 译 资 料

第 九 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193,000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书号 17001·66 定价0.80元

(内 部 发 行)

EG 10/69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办理邮购启事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的不定期内部读物，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刊载国外新发表的马列著作，有关马列著作的研究资料，有关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传记材料以及他们提到或批判过的著作、人物和流派等方面的材料，此外还介绍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情况。读者对象为从事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发展史、国际工人运动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教学和编译出版工作者及党政军机关的理论宣传工作者。

(一)本资料每年约出六辑，每辑二十万字。由新华书店内部发行，单位和个人均可向专区以上新华书店内部发行组购买。

(二)鉴于尚有一些单位和个人买不到本资料，本编辑部从第八辑起办理邮购(第一至七辑已售完)。每册定价八角，邮费另加：平寄本市五分，外地九分；挂号本市一角七分，外地二角一分。凡邮购者可将现款经邮局汇寄：北京西城西斜街36号《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或由银行汇款，银行汇款名称：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辑部，开户：北京人民银行西单分理处，帐号89010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第九辑 目 录

恩格斯：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

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 (1)

恩格斯：蒲鲁东《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摘录..... (34)

蒲鲁东言论录 (39)

一、个人经历 (39)

二、政治和经济 (66)

三、所有权问题 (86)

四、关于社会阶级 (98)

《哲学的贫困》是《资本论》的萌芽 亚·马雷什 (114)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写作、出版和

传播 吴锡安 (136)

论列宁给高尔基的书信..... 列·加米涅夫 (157)

列宁在十月武装起义的日子里

(《列宁年谱》选译) (163)

EG10/09
纪念威廉·李卜克内西逝世八十周年

- 革命的士兵 威廉·李卜克内西(195)
世界政策、中国动乱、德兰士瓦战争 威廉·李卜克内西(198)
祝贺威廉·李卜克内西七十寿辰 奥·倍倍尔(230)

《格拉纳特百科辞典》人物传记选译

- 季诺维也夫传 (239)
加米涅夫传 (247)
梁赞诺夫传 (255)
雅罗斯拉夫斯基传 (257)

书讯: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

- 一书出版 唐春华(264)

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一书的批判分析¹

J. Engels

比·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关于革命实践
和工业实践的习作选》

1851年巴黎加尔涅兄弟公司版^①

(1)“**致资产阶级**”。“你们资产者过去向来是最勇敢、最干练的革命者……”。早在蛮族入侵之前，你们就用自己的市政联盟当作白布尸衣在高卢把罗马帝国裹起来了(第1页)，从那时直到现在，你们一直在领导革命。没有你们或者违背你们的意志而想完成某件事情，一次也没有成功；你们所从事的一切都成功了，你们将从事的一切也必定会成功。

这个论题是以历史宣言的形式陈述的。——

目前，老政治阴谋家又掌握了政权，把你们看成是革命者(第V页)。那有什么，你们就接受头衔，当革命者吧！

(2)**现在转入正题**。下面是七篇习作，目的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发挥：

(a)以前的秩序，(b)革命时刻的政党，(c)解决办法，即本来意义上的革命(第1—2页)。

① P. J. Proudhon. *Ide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 (Choix d'études sur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ndustrielle).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51.——编者注

第 一 篇

〈反动造成革命〉

不能阻止任何革命。德罗兹认为通过让步和巧妙的计谋可以防止第一次革命²，布朗基认为用欺骗的把戏可以把革命化为乌有，这两种想法同样都是可笑的(第3—4页)。

法国的君主制从克洛维到黎塞留是革命的；1614年最后的三级会议开会期间，它变为反动的了，惩罚就是1793年的1月21日³。可以给革命规定方向，可以抑制它和延缓它的进程，而这种一步一步退让的办法是最明智的办法(第5页)。但是停止革命是不可能的。其证明就是对1822年和1839年的密谋的镇压⁴，以及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但是“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的政府的高傲”经常同革命的和平发展相对抗(第8页)。反动总是引起革命。在1789年和后来的一些年月里是这样，在1848年也是这样。在二月，参与资产阶级和王权之间争论的无产阶级，只要求工作。共和派答应实现这个要求，于是它就站到共和派一边(第10—11页)。“得到工作和挣到面包，这就是1848年工人们的要求，这就是他们为共和国所建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这就是革命的实质”。[宣布]共和国是“多多少少……要篡权的少数人的行为”。“革命的劳动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共和国曾经只是“革命的保证”(第11页)。

临时政府对待自己关于工作的诺言是认真的，但是没有能够兑现，因为它为此不得不“改变方针，更改社会的整个经济”。然而它不是公开承认困难和求助于政论家，而是沉默，直接走上反动，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个“革命所采用的新名称”的敌人(第13页)。它推动巴黎和卢昂的饥饿的群众举行起义，并力图把二月的伟大思想——工人的抗议淹没在血泊里。从此人们清楚了，1848年共和国和1793年共和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1848年共和国的最新发明是社会主义。

所以，现在，斗争是在过去的一切革命派别为一方和社会主义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如果说一开始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从1848年2月开始的反动的行动就在这一方面启发了我们——“革命正是由反动决定的”(第17页)。

对反动和迫害如何逐渐使国家的大部分革命化，对“秩序的永

恒朋友”资产阶级本身如何受到怀疑、因此受到排挤、从而被赶进革命的怀抱，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直叙述到新的选举法⁵。

于是，“人民被弄得丧失了理智”，剩下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力量”（第26页），——

而就1852年危机⁶来说，这种“力量”则表现为这样的一系列措施，其最后一环将只能是完全恢复封建的旧秩序。

但是你们不可能这样做，你们也没有胆量这样做（第31页）。号召共和派现在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给“革命”提供“保证”，提供“经济复兴计划”（第33、34页）。

第 二 篇

〈十九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的理由吗？〉

1. 〈社会趋势的规律。1789年革命 只完成了它的一半事业〉

“革命的激发原因与其说是当时社会所遭受的贫困，不如说是贫困的持久性，这将导致任何幸福的消除和消灭”（第36页）。因此，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的**趋势**。人民不是乐观派，也不是悲观派；他们不要求完满的社会制度，但是希望“存在幸福和美德的趋势”；“当他们面前出现贫困和堕落的发展趋势时”，他们就起来反抗（第37页）。

那么当前社会的趋势是什么呢？

1789年只是推翻，而根本没有建立任何东西。由此产生了“骚扰了法国社会六十年的那种不堪忍受的生活方式”。

（这样说来，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中就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自由竞争只有消极的意义，因而**真正的**资产阶级制度还有待去发现。）

1789年8月4日消灭的封建组织没有被新的“民族经济和利益的均衡”

所代替。“由于公民的地位已经不决定于出身,由于只有劳动才是一切(?) ,而财产本身又取决于劳动……十分明显的是,革命的问题在于……到处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秩序[le régime égalitaire],即工业秩序”(第39页)。

(似乎这一点并没有尽力去实现!)

但是人们并不理解这一点,只是置身于政治。“经济知识的缺乏、政府观念⁷ [l'idée gouvernementale]^①、他们对无产阶级的不信任”,——这一切促使革命者走上错误的道路(第40页)。“在一切人的头脑中,政治同工业相比又获得头等重要的意义;卢梭和孟德斯鸠排挤了魁奈和亚当·斯密”(!!!),所以新社会始终停留在萌芽状态(第41页)。

2.〈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社会贫困化的趋势〉

“我把某些活动原则称为经济力量,这就是:分工、竞争、集体力量、交换、信贷、财产。它们对劳动和财富的关系,也就是阶级区别、代议制、继承君主制和管理的集中化对国家的关系。

(对比得不错!)

如果这些力量保持均衡,并服从于它们自己所特有的和决不以人的专断为转移的规律,那么可以认为劳动是有组织的,普遍的福利是有保障的。而相反,如果这些力量失去方向和平衡。

(同什么平衡??),

那么劳动就会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经济力量的有益效果中就会掺进同样份量的有害效果:亏空就会抵销盈利;社会作为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中心、代理机构或主体,就会处于病痛不断加重的状态”(第42—43页)。

到现在为止,大家只知道两种社会存在形式^②:“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另外在这两种形式之间还存在着对立和根本的矛盾”。

“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它们同政府制度这种唯一阻碍它们组织的东

① 蒲鲁东著作中是:“政府偏见”(« le préjugé gouvernemental »)。——编者注

② 蒲鲁东著作中是:« l'ordre dans une société »(“社会的秩序”)(第43页)。——编者注

西的斗争，——这是损害法国社会的病痛的真正而深刻的原因”。

（这样一来，蒲鲁东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把法国官僚政府同既统治自己又统治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正常状态混为一谈）（第43页）。

例子：（1）“分工”。——现代工业的基本原则，同时是工人愚昧和工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例如在英国，由于分工和采用机器，工人人数在同一个企业里减少到以前的 $\frac{1}{2}$ 、 $\frac{1}{3}$ 、甚至 $\frac{1}{6}$ ，“而后是工资以同样的比例下降，平均[每日]从3法郎降到50和30生丁”（11）（第46页）。

如果去掉这些引人注目的资料（第46页），那就极为平淡了。

（2）竞争。——“它正是市场的规律、交换的调料、劳动的食盐”。

（真妙！）

“但是竞争丧失合法形式（1），丧失高级的和起调节作用的理性基础，它本身也受到曲解”。除了导致工资下降的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工人被排除于竞争之外。竞争变成了垄断，并造成了新的贵族”。

非常平淡。

“不久前，当警察局长

（对卡尔利埃的恭维话）

迎合普遍的愿望，允许自由出售肉类⁸的时候，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自由竞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人民的福利，这种保障^①在我们社会里还是一个怎样的幻想”（第48页）。

好一个庸人！卡尔利埃先生的资产阶级措施竟成了社会主义的措施！自由贸易因为在法国不存在所以是社会主义的！

其次，信贷。法兰西银行的垄断。按照蒲鲁东的看法，这种垄断的罪过在于，“财产负担着逐渐增加的抵押债务120亿，而国家负担60亿”；利息和其他与这项债务有关的费用每年达到12亿，

（仍然只占6%）

① 在蒲鲁东著作里前几行写道：“竞争应当成为……买卖诚实的保障”。——编者注

此外，每年有7亿到8亿用来支付票据，“化在预付基金和以公司股票、股息、无保证债券、诉讼费用的补偿等形式出现的延期支付上”；它的罪过在于，房租和地租由于这一切而提高得超过了极限，100亿年产值中有60亿用于寄生性消费⁹（第51—52页）。

接下去的例子或引文是用来证明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而他们的收入则象马尔萨斯所推算的那样按算术级数不断减少，也就是：

65生丁、60、55……15、10、5、0、-5、-10、-15（第52页）。

在这之后据说就到来这样的时刻，那时工人不仅得不到他每天劳动所应得的一定数量的生丁，而且自己另外还要支付5、10、15生丁！这就是工资规律！这就是竞争！！

下面的例子证明，人民的生活状况从革命以来在不断恶化。

酒类、肉类等的消费量减少；“招兵时对身高的要求”降低和不适于服兵役的人数增加：1830—1839年——45 $\frac{1}{2}$ %，1839—1848年——50 $\frac{1}{2}$ %；普遍教育不适应现代社会状况；犯罪行为增加：

1827年—34908件刑事案件，被告47443人

1846年—80891件刑事案件，被告101433人

1847年—95914件刑事案件，被告124159人

在违警法庭里：

1829年—108390件，被告159740人

1845—152923件，被告197913人

1847年—184922件，被告239291人

3.〈政府的反常，暴政和营私舞弊的趋势〉

1848年以前，工人甚至普遍得到政府方面的慈善性照顾。从1848年以后进了一步：人们开始明白，只有革命才能在这里作出某种激进的事情，然而情况也只是如此。

1814年国债的利息为6300万，而现在为2亿7100万。1802年的预算是5亿8900万，1848年是16亿9200万；它的增长不能用政府的愚蠢和居心不良来

解释。从1830年到1848年，支付给官吏的薪俸总额增加了6500万。原因同样。

(法国共有官吏56万8365人，蒲鲁东根据这个数字计算出，每九人中有一人靠预算生活，也就是说，法国总共只有男子511万5285人，而1848年投票的人竟超过650万！)(第62页)。

官吏数量的这种增加和军事预算的增长证明加强惩治权力的必要性在增长，从而证明无产阶级^①对国家的危险在增长。国家支持大地主和资本的这种趋势直接导致营私舞弊，而营私舞弊则是一切集中化的直接后果。

——结果是：

“十九世纪革命有充分的理由”。

此外，在这第二篇里还遇到如下的妙论：

(1)“现行的税收制度……打算让生产者支付一切，而资本家分文不出。实际上十分明显的是，即使后者作为某一款项的缴纳者列入税务官员的账簿，或者他缴纳国库规定的消费品税款，他那只是从他的资本那里预先得来的、而不是由他的产品的交换得到的收入，也是免税的，因为交税的只有生产者”(第65页)。

后面的这个“因为”一词包含着第一句话中应当加以证明的那个论点，因而这个论点自然地得到了证明。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坚定的逻辑。他又对这个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这样，资本和当局之间存在着只让劳动者负担税款的协议，我已经说过，这种协议的秘密只是征收产品税而不规定资本税。资本所有者借助这种蒙混的手法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他同其他一切公民一样地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房屋、自由的动产、自己的转让财产的交易、自己的旅行和自己的消费交税。因此，他硬说，假如他的收入在纳税之前是3000、6000、10000或20000法郎，由于纳税，就不会超过2500、4500、8000或15000法郎。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预算的膨胀比他的房客更为不满。纯粹是欺骗！资本家分文不出：政府同他处

① 蒲鲁东著作中是：«des classes laborieuses»(“劳动者阶级”)(第63页)。——编者注

于同等地位，就是这么一回事’。

（当政府从生产者那里拿走一部分产品时，它也同生产者处于同等地位，甚至可以说，资本家也同生产者处于同等地位。）

“政府和资本家在作共同的事情”

（啊，施蒂纳！）

“若能作为2000法郎利息的收入者而列入纳税人账簿，其唯一的条件是用利息的四分之一去偿付税款，有哪个劳动者不认为这是福气呢？”!!!（第65—66页）。

（2）土地册是这样编制的，“似乎立法者①的目的是恢复不动产的不可转让性，似乎这个立法者竭力不断地使8月4日夜裡获得解放的农民¹⁰回忆他以往的奴隶地位，回忆占有土地的权利并不属于他，以及每个庄户人如果没有从君主那里得到赠与证书，他就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长期佃户和没有权利支配自己财产的农奴[emphytéote et mainmortable]！”（第66页）。

啊，施蒂纳！似乎大地产和小地产有同样的理由不应当记入土地册，这样一来，路易-菲利浦本人也是农奴了。

（3）自由贸易的结构和对保护关税的说明。

关税给国家提供1亿6000万。假定取消了关税，外国竞争在法国市场上加剧了。“假定那时政府向法国工业家提出如下的问题：你们为了保护你们的利益宁愿支付给我1亿6000万呢？还是把这笔钱留在自己手上？你们是不是认为工业家会选择第一条建议呢？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正是这一条。国家把1亿6000万算作我们通常购买外国商品和把本国制品输往国外所花的费用，它把这笔钱作为贿款放进自己——仅仅是自己——的腰包：这就是关税”（第68—69页）。

如果这类荒唐事还可以用不理智的法国税率来辩解的话，那么蒲鲁东先生完全用法国尺度去衡量保护关税，把保护关税硬说成是向工厂主课税，就未免太过份了。

（4）在第73和74页上，蒲鲁东援引了鲁瓦埃-科拉尔尔的发言（下院，1822

① 蒲鲁东著作中是：“1789年的立法者”（第66页）。——编者注

年1月19日—24日的辩论)¹¹。这位法学家在发言中对独立审判所¹²（议院）和其他“民主设施”——这些“私人权利的强大集中点、君主国内部的真正共和国”的消失表示遗憾。据说，它们在一切方面可以给最高权力设置障碍，而现在政府的权力虽然是分散的，但其行动并不受任何限制。

这位守旧的法学家不能掩饰他对行政制度的仇恨，他的这套反动的怀旧言论被蒲鲁东先生错误地当成是社会革命的观点。

“鲁瓦埃-科拉尔先生关于1814年君主制所说的话，对1848年共和国来说，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公正的”。

鲁瓦埃-科拉尔的胡言乱语把蒲鲁东先生弄糊涂了：

“这样一来，宪章¹³应当既组织政府又组织社会；无疑人们没有忘记社会，没有忽视它，但没有立即着手研究它……”。

鲁瓦埃-科拉尔是怎样理解社会的，可以从他的下面这句话中看出：

“只有把出版自由确立为公众权利的标准，宪章才使社会恢复本来的面目”（第75页）。

可见，社会——这是在对抗政府的能力方面受到考察的臣民。

第 三 篇

《论联合的原则》

在我们着手解决问题之前首先“应当评价作为需要向民众提出的理论的重要性，这种理论是一切革命必不可少的行李”（第79页）。然而在我们批判这些理论的原则的同时，却把所有这些理论——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卡贝、路易·勃朗和其他人一下子全都抛弃了。对一切体系来说，这个原则就是联合。

联合并不意味着“经济力量的均衡”，它甚至根本不是“力量”，它是“**链条**”（第84页）。联合原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总是导致**体系**，而以体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然变成**宗教**（第84页）。

联合不是“经济力量”，贸易才是这样的力量，因为“不管运输的物质条件所提供的服务如何，贸易本身是消费的直接刺激者，因而是生产的原因之一，是创造价值的起因（！）、形而上学的交换行动，和劳动一样，是实物和财富的生产者，虽然它是用与劳动不同的方式创造它们……因此，靠没有任何投机倒把（！！）的生意而发财的商人，完全有权享受已获得的财产；这种财产就象劳动赢得的财产一样合法”。

（这位资产者在这里忘记了，不掌握资本，我决不能从事商业，而只能为他人、为资本家劳动，这样吹捧商人实在太妙了。）接着……

“交换——这是纯道德的行动……也是创造性的行为”（第85页）。

属于经济力量的还有集体力量。

——蒲鲁东感到自慰的是，他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发现了集体力量，——而竞争、分工、财产等等也是这样。

蒲鲁东称之为“经济力量”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是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生产和交换[Verkehr]方式的形式：它们对他有利，在他看来它们暂时或者只有好的方面，或者虽然是坏的方面但同时却有一种明显的好的方面。甚至最一般的交换和生产形式——这些形式一经被发现，后来的每一代人就以相应的改变了的形式到处加以运用，这些形式是属于象水力利用，地圆说、地球分为经纬度等等那样的社会的既得物——蒲鲁东也只是按照它们的资产阶级面貌去理解。例如，正象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交换在他那里立刻溶化在贸易中。如果说集体力量至少看起来是某种永恒的东西，那么它因此而仅仅是一种要社会存在本身变为经济力量的尝试。没有社会，同样就没有集体力量，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没有任何交换。交换、分工、竞争、信贷是集体力量的表现。要发生任何关系，至少需要要有两个人，凡是两个人共同从事某种一个人不能胜

任的事情的地方，就有集体力量。但是，可笑的是，人们一开始告诉我们社会成员借以进行交换和生产的一切形式是力量，而后来在结尾时又企图把社会、社会生产和社会交换的存在作为特殊的经济力量强加给我们。但是，蒲鲁东所津津乐道的原始的、不发达的集体力量形式（在建造方尖碑、金字塔等时的大规模的劳动）几乎早已被机器、马匹、分工等等所排挤，并完全被另外的形式所代替。

而如果说贸易、竞争、分工等等是经济力量，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不认为例如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纸币、小地产、大地产、雇佣劳动、资本和利息也是经济力量。对这里列举的每一种力量，都不难作出象蒲鲁东对前者所作的那种称颂。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可笑的是，蒲鲁东在第 88 页上把这些力量的关系称为“**实际上非物质的**”，并根据它们的所谓非物质性质，唱起了自己的赞歌，例如：

经济学家们如何用自己的工业力量理论——他们对这种理论丝毫不怀疑——证明基督教神学的基本教条：“**de nihilo**”进行创造

(ex??)①（第 87 页），或者在前面一页[他强调]

“贸易——他认为同样是**创造性行动**——的**纯道德的**”行动（第 86 页）。

下面接着是关于联合的冠冕堂皇的诡辩：

“联合在本质上是不产生成果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束缚工人的自由。为博爱的空想负责的作者们……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地把只有集体力量、分工或交换才具有的优点和效力……归之于**协作社契约** [contrat de société]。如果某个工业的还是商业的协作社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或者使巨大经济力量中的一种发生作用，或者利用这样的财富[fonds]源泉，而这种财富源泉的本质本身又要求它是不可分的，是统一的主顾、垄断者，那么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协作社可以获得有利的结果。但是它取得这个结果不是由于

① 蒲鲁东的笔误：“de nihilo”——“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第 87 页）。恩格斯纠正为“ex[nihilo]”——“从无中”。——编者注

自己的原则，它将把这个结果归功于自己的手段。而这一点如此之正确，以致所有的人。

(不，是资本家)

每当没有联合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时，就宁愿不参加联合”(第80—89页)。只有在需要的时候，人们才联合起来。

联合意味着团结、“共同负责、对第三者来说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平均工资是联合的最高法律”。因此，“可以说，联合只有对它的能力弱或懒惰的成员，只有对这样的成员，才有好处。”——“愚笨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的团结”(第89、90页)。每一个繁荣的联合的“巨大成就都归功于某种与联合格格不入和与联合的本质毫无联系的客观原因”。联合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是有益的(第91页)。

同时，在目前所有的工人联合中，平均工资被piece-work^①所代替——在力量和资本统一的条件下，团结尽可能少些，独立尽可能多些。

也就是说，联合尽可能少些，而资金尽可能多些。

“专门因为家族联系和自我牺牲的法则而建立起来的联合，不顾任何外部的经济考虑和任何占主导地位的利益，总之，为联合而进行的联合，是一种纯粹宗教的行动，是一种超自然的没有积极价值的联系，是一种神话”。

至于巴黎工人的联合，蒲鲁东冷静地给它们作了如下的分类：

“它们当中有许多维持下来了，甚至有希望进一步发展。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些联合是由本行业中最熟练的工人组成——这是天资的垄断，它们靠这种垄断才得以存在。其他一些联合用廉价来吸引和留住顾客——竞争使它们有了生机……最后，在所有这些联合里，工人们照例……必须耗费较多的劳动，而满足于较少的工资。在这里，除了政治经济学中最常见的现象，其他什么也没有，而要知道这些现象……丝毫不需要联合”(第96—97页)。

屠宰牲畜的联合根本就不是联合。“这是不同处境的公民为了同肉商的垄断进行竞争而共同出资建立的[联合会]。这是新原则——不说是

① 计件制。——编者注